

问学谏往录

问学谏往录



片照的平九四九一者作

問學諫往錄 目錄

引言	一
一、家鄉與家世	三
二、蒙師與業師	一五
三、青年會中學的師友	二三
四、清華兩年的收穫	三三
五、問學新大陸 (一) · 密蘇里大學的三年	四三
六、問學新大陸 (二) · 康乃爾大學的三年	五九
七、歸國途中	六九
八、上海六個月	七九
九、教學相長 (一) · 南開東北燕京五年半	八九
一〇、教學相長 (二) · 清華五年	一〇一
一一、漂泊西南 (一) · 從北平到重慶	一一一

一二、漂泊西南（一）· 楞口於四校……………	一一三
一三、漂泊西南（三）· 成都十年……………	一三三
一四、何莫學乎詩（一）· 誼兼師友的吳雨僧……………	一四五
一五、何莫學乎詩（二）· 朱佩荻及其他詩友……………	一五七
一六、是亦為政（一）· 談教育……………	一七三
一七、是亦為政（二）· 談憲政民主……………	一八七
一八、轉徙東南……………	一九九
一九、萬里寄蹤（一）· 華盛頓大學十九年（上）……………	二〇九
二〇、萬里寄蹤（二）· 華盛頓大學十九年（下）……………	二一九
結語……………	二二七
後記……………	二二九

引 言

幾年以前劉紹唐先生來信約我為「傳記文學」寫稿，要我敘述個人求學和教學的經歷以為「後進」的參考。慚愧得很，我一再遷延，久久不曾下筆。今年夏天我從華盛頓大學退休，結束了四十二年的教學生涯，於是鼓起勇氣，趁著這新獲得的一些閒暇，着手寫稿。自知一生毫無建白，不但談不到「立德」「立功」，便「立言」也不能做到。「一家言」。我這樣的人是沒有資格，沒有理由寫自傳的。東塗西抹，耗費了不少的紙墨，也不能成「一家言」。我這樣的人是沒有資格，沒有理由寫自傳的。然而自念七十年來所受於親長師友扶持栽培之恩，至深且大。若能向「傳記文學」的讀者作一簡略的報告來紀念他們，或者可以勉強作為我對他們一點細微的報答。他們對我期望甚殷，我的「成就」遠不符他們的期望。追述我求學教學的經歷實際上就是檢討我種種的不長進。年過七十，往者既不可諫，來者也可少可追。我這篇「問學誦往錄」既不成為傳記，也不够文學的水準，充其量或者可以作為青年學子「前車之鑒」罷了。篇中涉及一些瑣細事情的回憶，在一個平庸人的經歷當中雖不是沒有意義的，但實在都無關宏旨，更不免索然寡味。我謹向讀者告罪，並且懇求他們寬恕，原諒。

五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一、家鄉與家世

我們蕭家的祖籍是江西省中部偏西位於贛江西岸的泰和縣，但我却出生於江西南部離梅嶺不遠的南安縣（今名大庾縣）。那時先祖父星北公任南安縣教諭。先父丕侯公，先母湯夫人和兩位未出嫁的姑姑隨侍在任所。我出生的日期是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一月初六日，當公曆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民國三十七年夏末我在南京辦理出國手續，外交部的職員在我的護照上把十一月誤寫作十二月。我只好將錯就錯，把生日改晚一個月。）先母生了我約一個月，不幸便病故了。這沒有母親的嬰兒由兩位姑姑帶養。不久以後先祖辭官回籍，兩位姑姑先後出嫁。到我六歲的時候先祖棄養，先大伯父唐侯公，先四叔烈侯公，先五叔威侯公從四川省奔喪回籍，會同先父辦理喪葬大事。大伯父見我乏人領帶（先父尚未續娶），他那時還沒有兒子，商得先父同意，於喪葬完畢後帶我同他去四川西部的崇慶州（兩年後搬到川東的重慶〔巴縣〕）。於是我便永遠離別了故鄉。因為我久居重慶，至今說話還帶著一點川東的口音。泰和的「方言」雖能聽懂，卻不會說。無怪有些人誤認我是四川人了。

泰和縣北門外和西門外的鄉間有兩個同姓不同宗的蕭族。我們這一族世居縣西的千秋鄉上田村。照族譜的記載，我們的遠祖是西漢第一任的宰相蕭何。（其實年湮代遠，這是否事實，無法確定。）

居住在河南省的後裔，於北宋末年南遷，在秦和縣落籍。上田村地勢不高，鞏江每三五年泛漲一次。村裡的住戶（全是蕭姓族人）照例避居樓上，水退之後才能下樓。好在準備有素，因漲水而受到的損失並不嚴重。這種樓居避水的生活我向約略能够想起。

上田蕭族人口衆多。村中的建築各房各家大小不一的住宅外，還有幾座合族及分房的祠堂，和族曾祖蒲邨公創議興建的藏書樓一所。據梅谷教授 Professor Franz Michal 說，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之後，浙江大學避寇內遷，曾在秦和縣停留了一些時候。隨校遷徙的教職員學生借用上田村蕭族的「公廨」房屋作為臨時的教室和宿舍。（他那時在浙大任教，後來到美在華盛頓大學任教。）我們的族人多數守著傳統習慣，或耕或讀。「治舉業」的雖大有人在，但中鄉舉成進士的却為數無多。我的一位族兄（名發文）讀書「過目不忘」，經史百家的書籍，多能隨口背誦。但十幾歲「入學」以後便「困於場屋」，毫無進展。先祖父「入泮」以後，屢試不第，因此絕意仕進，並鼓勵子姪棄舉備就商。

蕭族在「功名」上雖少成就，在商業上却有不尋常的發展。嘉慶道光年間有幾位祖先開始沿長江西上，遠入川西，往來販運各地物產。長期努力經營，業務逐漸擴大。到了光緒中葉，「怡豐號」成了一個著名的商號。華西華中各地（包括重慶、漢口、長沙、揚州）都有分號。怡豐號除大規模運銷長江上下游各省出產的重要商品以外，也兼營淮岸官鹽的運銷。我的兒童時代正值業務盛極將衰的時期。這坐落在重慶城內陝西街的高號只經營大宗批發，並不做「門市生意」，因此怡豐號的建築格式與一般商店不同。這是一幢廣庭深院，高樓大廈的建築。前門開向陝西街，後門開向曹家巷。重慶是

一座山城。曹家巷的後門是在最後一進房屋二層樓的背面。前幾進的房屋是重慶分號的「辦公室」、「會客室」、「餐廳」，和「店員」、「學徒」，各項僕人等的「宿舍」。後幾進的房屋是分號老闆（經理）和家屬的住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大伯父由崇慶州分號經理升任重慶分號經理。我隨著他全家遷居陝西街的住宅，直到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怡豐號決定歇業，才搬出去，在城內玉帶街馬家巷一處較小的宅子居住。陝西街住宅最令我留戀的地方是最後一進三樓左側一個面積十餘方丈寬大平坦的「屋頂花園」。天氣晴朗時大姐、二姐（大伯父母的兩個女兒）和我常常上去玩耍眺望。重慶南岸的山嶺，江上往來的船舶都清晰可見。陝西街房屋各處門上廳柱上有不少石刻或木刻的對聯。我現在尚能憶及的只有兩副：其一是一副傳黔國，派行蘭陵」。另一副是「文習六經，武習七經，歷代勳猷有師法；男修九德，女修四德，一家雍肅得光昭」。民國二十六年秋末我避日寇，由北平經濟南、漢口到重慶，在馬家巷的舊宅暫住了一月餘。那時大伯父母早已棄養。大姐二姐也都早已出嫁。大姐夫蒲叔葆（名駿位，是曾任一九〇九年十月中旬閉幕的四川省諮議議長蒲殿俊的三弟）也已經病歿。大姐帶著一兒一女寄居於此。暢話家常，不勝感歎。陝西街怡豐號的舊址租給了憲兵第三團。我曾在陝西街上走過一次，只好「過門不入」了。

怡豐號歇業，據我推測，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庚子拳亂以來全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情形都在轉變。舊式的商業，無論其規模怎樣宏大，逐漸不能應付新局勢。其二是怡豐號是一個純粹「家庭」企業的組織。蕭氏族人志願經商經過「學徒」式的訓練而有成就的都可以參加業務，升任各分號的「老闆」。他們與雇用的店員並肩工作，但他們不是雇員而是「所有人」。他們既然有決定業務方針

的力量，他們的行動便直接影響業務的盛衰。在開創和發展的時期，這些兼具「股東」和「經理」身分的族人大都小心謹慎，克勤克儉，努力工作。但是後繼的人豐衣足食，甚至「養尊處優」，忘記了前人創業的辛苦艱難，不僅不能盡心於業務，甚至沾染浮華，從事揮霍。於是營業漸趨不振。主持總號的族曾祖饒泉公相繼立斷，在辛亥革命的前兩年決定停業。正式停業的那天派人在一片爆竹聲中把高懸在陝西街前門上「怡豐」兩個金字的橫額取了下來，結束了一百多年締造成功的商號。

蕭氏族人大多，但與我接觸較多，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房」的幾位尊長和弟兄。先祖母在找出生前已經去世。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頗為憐愛。兩位姑姑出嫁以後，他對我更加着意照料。天氣晴朗的時候他時常領我到村中各處散步，一面走一面講些往古名人的事跡。走到村裡的「市街」照例買一點糖果給我吃。他逝世時得年不過六十一二歲。某一天下午客人來訪，他送客出門以後，端坐在中堂的椅上「無疾而終」。輩輩無知的我還要拉他起來，帶我同去散步。

大伯父自幼習商。四十多歲的時候升任怡豐號重慶分號的經理。這是一個極重要的職位。他辦事精明，交遊廣泛。商界人很少不認識或不知道「三老圃」。（他有兩個堂兄，冠侯和定侯。因此他雖是先祖父的長子，却排行第三了。）在怡豐號停業若干年前，他捐了一個「候補道」，並督晉京「引見」。當地的長官，川東兵備道，重慶知府，巴縣知縣，到任以後照例到怡豐號來拜訪，此外也偶爾互相往來。這種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聲氣的情形，在十九世紀以前尚不多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却逐漸普遍了。

有一位下小吾先生在那時重慶唯一的報館當主筆。他盡情揚發當地官吏的「黑暗」，觸怒了他們。有一位下小吾先生在那時重慶唯一的報館當主筆。他盡情揚發當地官吏的「黑暗」，觸怒了他們。伯父探明他並非亂黨，便去拜訪知府，代他疏解。不料這一來反斷送了卜先生的性命。有人暗中指使管監牢的獄吏把他害死，却報稱他「急病身亡」。

大伯父教我其為謹嚴。記得我在八九歲的時候，像一般淘氣的兒童一樣，時常嬉弄跳跑。有一次被他看見了便叫我站住，嚴詞誡責說：「這樣沒規矩，不象一個斯文人，將來祇好去抬轎。」後來見我讀書尚知用心，有時候背著我稱許我。他曾說「可惜科學廢了。否則舉人進士這孩子應當有份的。」（他捐了道員之後，替我捐了一個「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歲送我進京去「就職」。幸而不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無官一身輕」了。）他「不惜重金，延師教讀。雖然兩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學，他的主要目的還是在培植我。從我到崇慶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們都在家裡讀書。民國三年的夏天我壯著膽向他表示，想去進新式的學堂肄業。他當時未置可否。但次年春末他便親自送我到上海去投考學堂。

我的父親與我接觸的時間較短。他似乎不曾參加怡豐號的業務。他的生活事迹我所知道的實在極少。光緒二十九年他也住在崇慶州怡豐號的住宅內。那時他已續娶。我跟著我的生父和繼母在那裡同住了兩年。當大伯父帶著我去重慶時，先父繼母仍留在崇慶，兩年之後才搬到重慶。當他三十二歲的時候，便因肺癆病歿於陝西街怡豐號住宅內。臨終的前兩天他叫我到他的牀前低聲地囑咐我，大意說，「大伯父要你過房承繼，我當然很放心，但也很捨不得。我平日時常出門在外，不能多照顧你，我現在追悔不及。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讀書。你如願意經商也好。無論讀書經商，總要腳踏實地，專

心努力去去做。此外我望你將來成家立業，要看重家庭，看重事業，不要學我的榜樣。我多年來東走西奔，沒有成就，於人己都無益處。」十二歲的我在當時不能完全體會這些話的意義，雖然也感到傷心落淚。我雖不能做到他所期望於我的一切，但此後幾十年生活的方向多少受了他遺囑的影響。

喪葬完畢之後，繼續命我幫助清理先父的書札和其他遺物。怡豐號某職員說「五老本」在堆棧中存有一個大木箱，並伴同我去開看，結果發現其中盡是在日本出版的「民報」。這許多本的革命刊物究竟從何而來？我無法知道。先父是否與同盟會通消息？或者他與同盟會並無關係？這些刊物是由別人交給他代為存放？平日和他來往的幾個日本人是否與這一箱書有關？這些疑問都無解答。我當時蒙蒙無知，並不曉得「民報」是革命黨的刊物。我拿去給我們的廖老師（大伯母的異母弟）看，他說：「這是要不得的，快快拿去燒掉。」我因愛這些刊物的內容奇異，印刷精美，偷著留存了一套（第一至第四期）背著人翻閱。其中不少「非常異義」看了不懂，不敢去問老師，只好存疑候解。

七叔（在本房中排行第五）繼大伯父任崇慶州分號老闆。我在崇慶州的時候日常和他見面。他自己有四個兒子，但看待我同他們完全一樣，買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樣給我一份。他雖然自幼參加怡豐號的業務，但對於傳入中國不久的「西學」，尤其是「格致」發生了濃厚興趣。江南製造局和歐美駐華教士等所譯著的格致書籍（特別是關於化學的刊物）他盡力收集，細心研讀。不久之後他竟能「無師自通」，作小規模比較簡單的化學試驗。在崇慶州住宅中闢了一間較大的房屋作為他的試驗室，羅列了許多化學藥品和儀器，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學方法釀造葡萄酒。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漢口請專家鑑定。據說其品質不在煙臺張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還有過之。朋友們勸他出資設廠，擴大釀造，與張裕競爭。他也同意，着手進行。辛亥革命爆發，四川省內也發生了「護路」的風潮，大局動盪，籌備的工作便停頓下來。民國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長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輩不經商而入仕的一位。民國成立以後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民國四年我到上海進學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後來凡從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學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裡度假。在民國六七年間同時留住的的多到六人。加上他自己的四個兒子（長子伯昭曾留學日本和美國，短期從政後退居上海，其餘三人在上海就學）整整是十個人。那時他已經從虹口搬到民厚里。樓下的寢室都成了「學生宿舍」。閒飯時一老老少少漸漸地坐了一大圓椅。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嚴，期望他們也甚殷。他氣象嚴肅，不布言笑。我們對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間也大膽和他開玩笑。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樂（我們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裡吃了點心，回家晚飯時食量大減。他老人家便說：「平常罵人不用，說這是個飯桶。假如一個人連飯都不能吃，那豈不是比飯桶還不如嗎？」我們肅然靜聽，心照不宣。過後伯昭（我們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歲早死了）提議：「我們明天晚飯，一齊大顯身手。」果然，屆時菜飯上齊，全體落座，他老人家舉起筷子說，「吃罷」，這十名健將「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鐘桌上的菜如風捲殘雲，一掃而空。他忍住了笑，把廚子叫來說「菜不夠吃，快添來吧。」民國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華學校，他十分高興。聽說我從上海到北京（後來改名北平）的路費還沒着落（大伯父遠在重慶），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買好火車票，並給我一些零用錢。民國九年夏天我在清華畢業，回到上海，準備赴美。他明知學校發給每名畢業生五百銀元的治裝費，却另外給我百元，表示他對我的獎許。我上船的那天，他又親到碼頭來送

我。不幸他在我回國的前兩年病故。十五年秋季初回到上海，我只能到他的墓前而去「拜見」他了。

在嫡室和從堂兄弟當中叔玉八哥（名蓮，二伯父的第三個兒子）給與我在學業上最大的指導和鼓勵。民國四年五月間到上海就學的時候與他初次見面。他正在梵王渡聖約翰大學肄業，想叫我去投考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他發現了我的英文程度太低，甚至英文字母都弄不清楚，便介紹我到滬寧鐵路局任職的一位寧波人黃先生家裡補習。每天（星期日除外）清晨七點鐘去上課一小時。這樣補習了兩個月，雖然「大有進步」，去投考時依舊「名落孫山」。他於是勸我去投考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因為這學校錄取新生的水準較低，我居然考取了。民國七年夏天經他極力鼓勵，我壯著膽去投考清華學校的三年級（他在民國五年先已考入清華），也居然被錄取了。民國九年我在清華畢業。因為他在美國密蘇里大學經濟系畢業後進了那裏的研究院同時任經濟系的助教，我也決定去進密大，於是成了他的「同學」。一年之後，他轉學哈佛，在那裡也做教授們的器重。因為他要接教一位陪身美國牢獄的好友，他毅然犧牲了攻讀博士學位的計劃，用全力去籌措一切。（這位學法律的朋友出獄以後即行歸國，頗能潔身自好，曾在江蘇省某地方法院任職，總算沒有專員援救者的苦心。）叔玉回國後，先在天津南開大學任經濟學教授。我十五年回國以後，承他向學校當局推薦，我也到了南開，與他「同事」了兩年多。隨後他應聘清華，成了系中的一位「名教授」。民國二十一年，又經他的推薦，我從燕京大學轉到清華，與他再度「同事」。抗戰期間他受任為江西中正大學校長，不避艱辛，任勞任怨，極力整頓校務，提高教學水準。因此引起一部份教職員的反對，釀成「學潮」。他失望之餘，辭職而去。就任之前他曾堅邀我去長法學院。我自知沒有行政的才幹，一貫抱只教書，不預政的主張，未

肯應允。現在回想，不免感到慚愧。離開南昌（中正大學所在地）之後不久，他被派到美國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的經濟專家。當我於三十八年再度到美時，他已經在兩年前因心臟病突發，在紐約逝世，「人天」隔絕，永無見面之日了。這一位熱腸俠骨的學人，無論治學治事，都維持著精謹嚴慎的態度，不肯絲毫游移含糊。記得我初到密蘇里大學的那年，每日課餘，時常見面談論。有一次我不留心，用了「大概」，「差不多」這一類的字樣。他立刻正容規勸，要我從速拋棄這「中國人不長進的習氣」。我雖然不曾完全掃除思想上或言詞上摸稜的毛病，他的規勸，却至今未忘，使我受益不少。

嫡室兄弟八人中我和七叔的長子公遠，次子公通相處最熟。民國六年夏末，公遠從四川崇慶到上海考進青年會中學，與我同學兩年。十五年八月我由美回國的時候，他已結婚，在上海教書。那時二伯父已經去世，他的四個兒子也「各奔前程」，不在上海。公遠見我沒有住處便留我在他的寓所暫住，並且介紹我在江亢虎所辦的南方大學和一個股姓所辦的國民大學兩處擔任幾門課程，藉以維持生活。次年二月經叔玉八哥介紹到天津南開大學去任教，才與公遠分手，離開了上海。二十六年避日寇入川，在重慶再與公遠見面。隨後我們兩家先後都到了成都，見面的機會更多。他天份甚高，但沒有恆心，不肯切實用工夫。在聖約翰大學畢業之後，他自費「留學」美國。其結果等於在新大陸「觀光」了一次。他妙想天開，在美國芝加哥某「函授大學」註冊，繳了幾百美元的「學費」，不久之後居然「畢業」，得著了「法學博士」的憑照。這種取巧的作風，後來變本加厲。抗戰期間他在離成都西郊有名的青羊宮不遠的鄉間蓋了幾間茅屋，自稱精通「華陽派」的道教，有廣大的神通。若干川軍中下級將領信以為真，爭先恐後，請他「講道」或卜問吉凶。據他自己告訴我，有一天某幾位退職將

領約他同去遊山，並請求他表演「水遁」「土遁」。他讓他們先走。等這幾位先生走到約定的地點時，他已經含著微笑坐在一個亭子裡了。他們「五體投地」，心悅誠服。殊不知「蓬神仙」先期安排好了一乘滑竿，雇妥了幾名捷足的伙子，隱藏在出發點附近的樹林當中。等到這幾位將領走後，他坐上滑竿，輕捷路迅速前去。無知的軍人竟被他愚弄了。那時在國立四川大學任心理學教授兼教務長的葉石孫（譽）慶於「神仙」之名，拉我陪他前去，卜問時局的大勢。公遠說：「就卦象來看共產黨必然失敗，國民政府安如磐石。」葉公為之默然許久。我後來才知道，此君已作了「同路人」，因此聽了公遠的話為之不快，或竟吃驚。至於公遠所說，是就卦論卦，或想迎合國立大學教務長的心理，我不便追問，也無從推斷。他如果是前者，「神仙」的卦何其不靈？如果是後者，「神仙」何其缺乏「知人之明」？大陸沉陷以後他如果在成都，滯無音問，聽說曾被「清算」。這是意中之事，不可卜知。我追記這些事，不是譏責公遠，而是惋惜他「聰明反被聰明誤」，辜負了他所稟賦的天資。在我們中學同學期間我曾屢次勸他，希望他能善繼七叔精誠篤實的作風。他承認他的錯誤，但究竟不能改變。

公遠是我第二次入川到重慶時才見面的。他在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後，在某私立中學教課。「七七事變」之後回到四川，暫居重慶郊外山中。他的天資也高，不亞於乃兄。但秉性孤介，落落寡合，更不贊成乃兄的「妖言惑眾」。二十六年秋天他接受我的建議同我去到成都，在由遷遷川的私立光華大學附屬中學任教員兼齋務主任。他對文學頗有修養，口才也好，因此頗得學生的歡心。他管理「齋務」也很盡心。學生有違犯校章的他必反覆開導，並不是「照章處罰」便算了事。他在十五歲的那年，由七孀作主為他完婚，娶了一位比他大幾歲的崇慶州某家小姐，不幸兩人性情不合，終歸決裂，公遠因此鬱鬱寡歡。他得暇時必來看我，談詩論文。我也乘機為他排解。三十六年夏末我應聘國立政治大學，離開成都去到南京。他來送別，相對黯然。彼此都意識到此後再沒有見面的機會。（聽說他在民國四十年以後不久「因病」去世了。）

一個人的性格和習慣一部份（甚至大部份）是在家庭生活當中養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長和弟兄在不同時間，不同環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間接地，有意地或無意地，給與我幾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問學及為人的基礎。五四運動的健將曾經對中國舊式家庭極力攻擊，不留餘地。傳統家庭誠然有缺點。但我幸運得很，生長在一個比較健全的舊式家庭裡面。其中雖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父母雙亡的劫却得著「擇善而從」的機會。因此我覺得「新文化」的攻擊舊家庭有點過於偏激。人類的社會組織本來沒有一個是至善盡美的，或者也沒有一個是至醜極惡的。「新家庭」不盡是天堂，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

二、蒙師與業師

光緒二十八年隨大伯父入川。到了樂慶州不久之後他聘了一位本地老秀才羅老師來教大姐（九歲）、二姐（七歲），和我（六歲）三個孩子讀書。大伯父與羅老師商定，不用「三字經」、「百家姓」一類初學的課本而用「史鑑節要」、「地球韻言」、「聲律啓蒙」，和「千家詩」等書。「史鑑節要」是族曾祖滿邸公所編由蕭氏宗祠刊印的書。這書的目的是在給小學生一點中國歷史簡單的知識。內容是一首七言「歌訣」，總結幾千年歷史的梗概，和一箇四言韻文，分敘從盤古到明亡歷代的事跡。我現在尚記得開頭的幾句：

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繼之，物有群倫。

有巢構木，宮室是因。教民烹飪，則有燧人。

是爲遠古，概出傳聞。（下略）

「地球韻言」的作者和出版處我忘記了。這是仿「三字經」體裁一本世界地理常識的書：

今天下，五大洲。東與西，兩半球。

亞細亞，歐羅巴，奧大利，阿非加，

美利駕，分南北，穿地心，對中國。（下略）

「聲律啟蒙」和「千家詩」是兩本在私塾中常用的書。前者（俗名「對子書」）的作用是奠定小學生將來學做詩的基礎。其內容舉例如下：

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下面還有七個字和九個字的對語，現在一時想不起了。）

「千家詩」是一個七言絕句詩的選集。其中多半是「理學家」的作品。因此這書除了給小學生些作詩的模範外，還可以無形中啟發他們的「道心」。下面這兩首就是極好的例子：

雲淡風清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子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這些書照我現在看來，都各有其價值或意義。但董蒙的我在當時多不能夠領會欣賞。其中「聲律啟蒙」比較淺近易解，雖有若干「典故」，經老師講解或看了書中的註釋也可以大體明白。加以「香韻鐙鐙」，不難「上口」「成誦」。「千家詩」的內容我也不覺得過於困難。七八歲的小孩當然不能體會詩中所含蘊的「性理」精義，但字面的意義却還懂得。「地球語言」讀起來有些「莫明其妙」。我去請教老師，他只能就字面「立說」。我們既沒有地球儀，「穿地心，對中國」這兩句在字面上也費解了。「史鑑節要」的內容老師是「耳熟能詳」，「如數家珍」，「如數家珍」，「如數家珍」，更不感興趣。我每天上午照例站在老師桌旁聽他講解，跟着他朗誦一段之後，便拿着書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去「苦讀」。到了下午我把

書放在他的面前，轉身「背誦」。如果有一句到時忘記，背不上來，他迅速地用三尺多長竹製的煙竿給我一個「當頭棒喝」。久而久之，我對於這書不但完全失却興趣，並且望而生畏。

羅老師教了我們一年便解聘而去，由一位外省人樊老師繼任。（大伯父認為羅老師過於憑仗「夏楚之威」，不合「循循善誘」的原則。）樊老師據說是王湘綺（聞運）的弟子。現在來教蒙學，他覺得是大材小用。他不但我們懂與不懂，喜歡高談文章，義理，或經世之學。每逢宴會，必須請他坐首席。有一次他面前的酒杯數有缺損，他認為是有意痛慢他，因而勃然大怒。不用說，在這一年中我們的學業沒有顯著的進步。

光緒三十一年到了重慶之後，我們的第一位老師姓馮。他是江西同鄉。因為年紀較高，頗能耐心教導。那時候二伯父已經去世，二伯母帶着十幾歲的兒子來依靠大伯父。炳元哥雖然自幼雙目失明，也每天同我們一齊上學。他的書由老師唸給他聽，並一面講解。他的記憶力甚強，聽完以後大體能够記住。遺忘的地方再由老師唸給他聽。有時候他「靜極思動」，想出一些刁鑽古怪的方法教我們去和性情溫和的馮老師開頑笑。老師下午講完了書照例躺在一張長椅上睡一二小時，醒後才讓我們背書，並批閱我們習字的成績。到了黃昏時候便放學，讓我們「回家」。他既不用鐘表計時，只看「天色」，我們放學的時間當然或早或晚，不盡一致了。有一天（陰曆五月初）炳元哥想出一個提早放學的計策。他叫我們趁着老師熟睡，把他放在桌上的深度近視眼鏡的玻璃用墨塗黑了，然後大家一齊高聲誦書，把他驚醒。他翻身起來，睜眼朦朧，帶上了眼鏡，便說，「呵，今天多睡了一會，天黑了，放學罷」。我們早有準備。他發言甫畢，我們已一聞而散。第二天上學，他也不責罰我們，只是說，「大海

氣了，以後不准這樣」。這位好好先生心平氣和，與羅、樊兩位老師的性格恰好相反。他對我們過於寬大，我們無知，並不努力用功去讀書。

廖老師教了我們兩年，因年老病多而辭館。繼任的廖老師也是江西人（大伯母的異母弟）。他開始教我們讀「論語」、「孟子」、「國語」等古書。「國語」只由他講解，我們閱看，但不背誦。「論語」、「孟子」於講解外，我們逐章熟讀背誦。我至今還能隨口引用這兩部要籍中的一些文字。這是廖老師所賜。

同時（光緒三十三年）大伯父為我們聘請了一位教日文的和一位教英文的老師。英文老師是重慶人王骨臣先生（名駿）。王先生的英文造詣似乎不能算是很深。他教我們的時間也很少，僅僅是每天一小時。我們那時對於中國書比較更感興趣，不大願意學這「蠻行文字」。因此四年之中我所得甚少。宣統二年冬天王先生辭聘，我們停止學習英文。民國三年因為我想去上海投考學校，請得了大伯父的允許，每晚去一位在重慶海關任職的福州人林先生所設的英文夜校補習兩小時。雖然一年之中，略有進步，然我的英文程度，依然低下，無怪到了上海去投考聖約翰中學未被錄取。（四年的春天，重慶法政學堂招生。大伯父想測驗我的程度，命我去報名投考。所考的科目除了國文、歷史等外有一門英文。英文題目頗為容易，只要考生用中文翻譯幾個簡單的句子。我居然勉強完卷，居然在錄取之列。事後傳說有若干投考的學生因英文繳了白卷而「名落孫山」。那時候內地學生英文程度欠佳，由此可見。）

教我們日文的先後有兩位嫁給中國留日歸國學生的日本太太。光緒三十四年到宣統三年是太田喜智（黃潤生太太）。她每天早晨八點鐘來，先率領我們到三樓旁邊平坦的屋頂上，在新鮮的空氣中，教我們做日本式的柔軟體操和唱一些日本兒歌（「桃太郎」是其中之一）。她一面領着我們唱，一面用風琴伴奏。（下雨天免去體操，在室內學唱歌。）大約十分之五分鐘之後，才教我們簡單的日文日語。（稍元哥已於前一年跟着他的母親到家鄉去了。學日文的只是兩位姐姐和我三個人。因為我的小名是「多元」，黃太太便叫我「フユネト」。）我們都喜歡體操和唱歌，但對於日文，和英文一樣，不願意用功。教到九點鐘，她終止授課。我們便接着上廖老師的課。黃太太因事辭聘，推薦剛木健（王致堂太太）來繼任。一年之後她離開重慶。我們於是終止日文的學習。我現在深悔當時不曾用心去學，失去了通曉日文的機會。

我們遷居馬家巷的那一年，廖老師辭館回籍。王骨臣先生介紹何篤貞先生（名世忠，廬生，四川銅梁縣人）來教我們。這是我幼年讀書的重要關鍵。從宣統二年正月起到民國三年十二月止，在這五年當中，在何師教導之下，我才粗淺地認識了中國經史文學的輪廓，經驗到學而時習的快感。嚴格地說，他不是所謂「經師」，「史家」，或「學者」。他却是一位優越的教師，雖然他不曾進過教育學院，或研究過教育原理。他針對學生的需要，選用適當的教材，引起學生的「求知慾」，領着他們在不知不覺間步步前進。

他認為「十三經」必須涉獵，但不必全部精讀熟誦。那時我已讀過「四書」了。他教我（一）「加緊熟讀」「詩經」、「春秋左傳」、「禮記」、「尚書」和「爾雅」；（二）隨後涉獵「周禮」、「儀禮」、「易經」和「孝經」；（三）此外「公羊傳」和「穀梁傳」在有餘力時「過目」一下。上列

第一類的五種並不肯論全書。其中他認為比較不重要的一小部份也由我翻閱一下，不去「精讀」。採用這樣「速成」的方式我居然在五年之中「讀」完了十三經。他不要我們讀「史記」「漢書」等史學要籍，而讓我們去細看吳乘權根據朱熹「通鑑綱目」所編的「綱鑑易知錄」。他教我們不必去管書中對於前代事迹的褒貶而專注意於事迹的本身。他這樣選擇教材，「經學家」、「史學家」或者會認為「不足為訓」。但照我推測，他自有他的理由。當他應聘的那年我已經十四歲了，而且「中學」以外我還要注意「西學」。如果教我去按步就班，窮經通史，不免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在那五年中近乎偷工減料地讀經史，給與我不少「國學」常識，後來受用不盡。這不能不歸功於何師。此外他時時鼓勵我自動選看「合胃口」的各種書，不限一家，不拘一格，因此培養我博覽的志願。這也是值得感謝的。

在文學方面，除了教我們選讀唐宋大家的「古文」以外，他也要我們選讀歷代的韻文。最初每天下午他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幾首唐人五言或七言的律詩或絕句。他講解了詩中的意旨，典故的出處，以及作法上的技巧等等以後，便讓我們用墨筆抄錄下來各自誦讀。這樣我們「手到」，「口到」，很容易地都能記住了。絕句和律詩之後，再選讀長短篇的古詩，從漢魏直到唐宋。（先用「唐詩三百首」，隨後運用各家的專集。）他又教我們就個人所好擇看「文選」中各體的辭賦。五年當中我們所讀所看的為數有限。但是何師的指導和鼓勵不僅啓發了我們對於文學的愛好，同時也培養了我們一點文學欣賞和鑒別的能力。

何師教了我們不到半年，便決定要我們「發筆」（開始學寫文章）。每五天他出一道簡單的題目讓我們作一兩百字的「論」，「說」，或「經義」。過了幾個月他所出的題目逐漸加難，我們「窗課」的篇幅也逐漸加長。經過兩年上下的練習，我們居然勉強能夠「洋洋灑灑」，「下筆千言」。進步迅速的原因大半在何師因勢利導，和盡心批改我們的習作。當他在晚間燈下評閱我們的窗課的時候，他讓我站在他的身邊，看他批改。他一面用筆批改，一面說明，何以某一字錯用，某一句欠妥，某一點發揮未能透闢，或某一處題旨未能明瞭。有作得較好的地方，他手不停揮，濃圈密點，表示獎許。（看何師批閱我們的習作是我獨享的權利，兩位姐姐不能參加。）題目的出處不限於經史，他偶爾也教我們學做「時論」。例如辛亥秋間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重慶的第二天，他所出的題目是「革命非叛逆說」。

何師不「保皇」而尊孔。除了初一和十五日我們放假不上學外，每天早晨頭第三人同走進書房，向「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長揖致敬之後再向老師一揖，然後分別就坐，開始作當天的功課。宣統二年正月下旬何師初到就館的那一天，由大伯父率領我們去拜見（他們東家「西席」相對一揖，我們向老師跪下）叩首）。每年三節（新年、端午、中秋）東家照例致送節禮。端午中秋兩節是每節銀圓十枚，盛在封面楷書「節敬」兩字的紅紙封套裡，隨着大伯父去到老師拜節的時候致送。「年敬」也同樣辦理，但是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後（也是老師啓程回家的前一日），大伯父帶領我去送下午「關書」（聘書）和「夫馬費」的時候，一併致送。夫馬費是制錢兩串（二千枚，約合銀兩元），作為何師由重慶到銅梁來回的路費。次年正月十八日（「燈節」）以後他回到重慶，我們一個月的假期於是終止。何師全年的「束脩」是教銀一百兩（約一百四十元）。照近年的物價計算，這待遇像很菲薄。但

在五十年前的四川這是十分豐厚的薪水。

民國三年的冬天，何師向大伯父說我們三個人的進步都極可觀，他也極其滿意。但他自問以後對我們的學業不能再有多少幫助，不如送我們去進學堂，或另聘「名師宿儒」，繼續指導，以免貽誤我們的「前程」。因此他請大伯父不要送明年的關書。大伯父極力挽留，但何師去意堅決。到了年終放學，他啓程回籍。彼此相對黯然，不忍分別。民國四年我去上海進學堂，民國九年我到美國留學，不時致書問候他。他回信屢次以「通今古，貫中西」助勉我。教導獎掖之恩，令我沒齒難忘。民國十二年的春天，他病逝家鄉，享年七十一歲。

三、青年會中學的師友

民四的夏天，我考進了坐落在上海四川路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的三年級。照舊算法，我那時已經十九歲了，比同班學生的年紀平均大三四歲。我雖然並未「自傷老大」，但深知「日月逝矣」，所以「寸陰是惜」，埋頭苦讀。我最大的困難，最基本的問題，仍舊是英文程度不足。（校中各門功課除了國文外，都用英文課本，在教室裡教員也多用英文講授。）為求解決這個基本問題，我把最多的時間，最大的努力，放在英文一門課程裡面。例如每日黎明，住堂的同學都尚未起床，我已悄然走上六樓宿舍上面的屋頂（這頗像重慶陝西街三樓旁屋頂的平坦寬大。）朗誦英文課本，約三十分鐘才回到宿舍去梳洗。所幸國文一門我不須多下工夫，把練習英文和應付國文剩下來的时间去做其他的功課（算學、歷史、衛生等等）。到了學期終了的時候，各門功課的成績都不低劣。我應當附帶說明：我「應付國文」不是看輕這門課程，而是因為我的國文程度高出全班同學，因此每次作文都名列前茅。這是業師何篤貞先生的恩賜。

一年的時間迅速地過去，我竟是二十歲的人了。如果我按部就班地讀下去，由三年級經四年級、五年級，然後升入六年級，假定中途沒有波折，我要到二十三歲才能在中學畢業，要到二十七歲才能

大學畢業。我想出了一個「爭取時間」的辦法：在學校招考插班新生時去報名投考五年級。萬一被取，便可越過四年級，「節省」一年的時間。主意立定以後，便在暑假當中加緊作應考的預備。我報考三年級時用的是我的「學名」（也是我的「排名」）萬平，但現在報考五年級不便仍用原名。在重慶讀書時，何師指導我習舊書，要我臨朝公權所寫的「玄秘塔」。我習字的成績雖然不佳，但我却很欣賞「柳字」。因此我便改名公權去投考。（吳雨僧先生在「吳忠詩集」卷九，卷十三和卷末等處，說我「名萬平，以字行」。其實我的「字」是「恭甫」。民國廿一年起自號「遠園」。有時候偶然先後用過「石涯」，「巴人」，「君衡」等筆名。）

徵幸得很，我居然被錄取了。更幸運的是，教我們五年級和後來六年級的有幾位飽學而兼善教的先生。教五年級最突出的教員是程萬里先生（英文、歷史），何庭然先生（數學），和馬瑞琪先生（自然科學）。程先生是浙江人，曾留學英國。他自己對於學問有真摯深厚的興趣，同時他盡心教導學生引起他們求學的興趣。他用流利的英語講歷史，既清楚，又生動。聽他講過之後再去書房有左右逢源之樂。他的英文修養既好，教學生又能引人入勝，批改我們的習作絲毫不苟。文法上的錯誤，修詞上的疏忽，他一改正之後，把習作發還我們，要我們仔細去覓看。過一兩天他在教室裡抽問我們，要我們指出何以這些是錯誤，何以要如此修改。一年之內我們的英文都大有進步。我居然也能下筆成篇，不至於多犯重大的錯誤。

何先生和馬先生都是廣東人，都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物理科學士。何先生教我們初級代數、平面幾何（五年級），中級代數、立體幾何（六年級）。他也用英文講解，不但明白曉暢而且時時妙趣橫生，使我樂聽忘倦，願意專心去學。每次上課時，他要全班學生在教室的黑板上每人解證一道他上次發給我們的習題。我們事先不知道他叫某人做某題，因此每人必須在上課以前把全數習題都加以解證。代數和幾何雖然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學術生活中，很少直接的用處，但極有助於思考的訓練。

馬先生教五年級的物理和六年級的化學。他除了講明原理以外，極注重試驗。他自己做槍雞一點的物理試驗，要我們細心觀察，但讓我們各人做簡單的試驗。化學的年終考試可謂別開生面。他不出試題要我們做「紙上談兵」的「化學文章」；却在試驗室的桌上，每一學生面前，事先放置擺了號碼的十瓶無色液體物質，要我們各人用簡單的「定性分析」方法，依次驗定這些物質，然後在卷上「註明，便算『完卷』」。他注重試驗的用意是要我們對心手並用的科學方法得一點初步的認識。第一到第九瓶我徵幸都順利地「分析」了。到了第十瓶時，我用盡了各種指定的定性藥品（reagents）都不曾引發預期的化學反應。我納悶了幾分鐘，正在束手無策，忽然想到「莫非馬先生給了我們一瓶蒸餾水？」我拿起這瓶中剩餘的流質，面對着他，裝做要喝的模樣，同時觀察他臉上的「心理反應」。他視若無睹，我心裡有數，在考卷上寫了「No. 10—H₂O」。（我相信馬先生讓我們化驗蒸餾水不是要尋開心，而是要啓示我們探求科學知識固然不能完全依賴書本，也不可盲目地循着指定的途徑去進行。）

葉楚傖先生是我們五年級的國文教員。葉先生除了在上海辦報，撰社論，用「小鳳」筆名發表一些小品文字外，還在學堂兼課。所得薪金略可添補生活費用。他「兩人北相」，身體魁梧，與「小鳳」筆名似不相稱。我們覺得他文學修養既高，態度溫文懇懇，又悉心教導學生。因此我們敬重他，也